

中国
学
术
前
沿
性
论
题
文
存

龙江学人卷

彭
放
◎
著

浪漫 的 思潮

——20 年文学观念之嬗变

有人说，爱思考是一种不幸，追求思维的求异性，是容易犯错误的。但要想有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不怕当反面教员，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它从反面映照真理的光辉。我是抱着一个目的，讲真话、讲自己的观点。我的真话也可能是谬论，人家批判我的谬论，我从中获得对真理的认识。在学术研究上，最可宝贵的是一种老实的态度，我希望自己做一个这样的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彭
放
◎
著

浪漫_的 思潮

——20年文学观念之嬗变

中 国 学 术

前 沿 性 论 题

文

存



龙江学人卷 II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的思潮:20年文学观念之嬗变/彭放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0
ISBN 7-207-06010-6

I.浪… II.彭… III.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文集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0373 号

责任编辑:吕观仁

装帧设计:于克广

浪漫的思潮

——20年文学观念之嬗变

彭 放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hs@yeah.net
排 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6.375
字 数	380 000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010-6/1·819

定价:32.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

龙江学人卷 II

刘敏中 主编

规范语言学的若干问题

明清小说还原批评

中国百年寻路反思

政治参与和民主

流入学与中国流人问题研究

词典·词汇·术语

浪漫的思潮——20 年文学观念之嬗变

构建新生活方式的社会学

福利——经济学的归宿

真善美的哲学寻踪

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制发展研究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

龙江学人卷 II



电 脑 制 作
0451-53001809 13603686402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山登绝顶我为峰

郑薇摄于长白山天池(2003.8)

彭放(1937—),男,原名彭贤贵,四川南充人。

1963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历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黑龙江省文学学院副院长,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专家,省政协文史组特约委员,省社科系列职称评审高评委等;享受国家级津贴专家,2003年被四川师范大学外事学院特聘为教授。

出版主要著作有:《文学人才学》(1992)、《彭放文论选》(2000)、《北大荒文学艺术》(合作,1988)、《黑龙江作家论》(合作,1997)、《黑龙江作家评论集》(合作,1989)、《灵感之谜》(编著,1986)、主编《郭沫若谈创作》(1982)、《黑龙江文学通史》(四卷本,2002)、《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上下卷,2005)以及专著《浪漫的思潮》等。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

龙江学人卷Ⅱ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龚江红

副主任

李文方

委 员

吕观仁 李文越 吴英杰

高翠华 柴力明 张晔明



出版说明

《1978—1998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文文存·龙江学人卷》这一选题的策划者,为黑龙江大学教授刘敏中先生,在“龙江学人卷”(第一辑)的作者选定、稿件组织、编委会组建、体例编排、拟收学科等方面,敏中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因而他理所当然地被公推为该书的主编。此书问世不久,便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国内外相关学者,盛赞此书,此书也于问世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再次印行。这期间,敏中先生已着手策划该书第二辑,并于 2001 年 4 月拟定了第二辑的作者与书目,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专题向省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因该书第一辑已被列为省重点工程项目),有关领导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也将该书(第二辑)列为重点选题。令人痛惜的是,此后不久敏中先生突遇车祸,溘然长逝,此书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组织者,我社也失去了一位最可信赖的朋友、学者。生前,敏中先生十分热心于本丛书第二辑的出版,可以说尽了他自己的最大努力;这种努力没有任何的个人功利色彩,完全是为着推动龙江乃至中国的学术进步,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著述计划而倾全力于此事。在敏中先生的积极组织下,第二辑书稿已全部完成。敏中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他为中国学术进步而孜孜以求的崇高精神始终在激励着我们,使我们不能不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否则,我们就无颜面对学术界的各位学者,无颜面对热切期盼该书问世的广大读者,更无颜面对敏中先生的在天之灵。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同作者共同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力争此书的早日出版。考虑到此书的历史原因和敏中先生的重要贡献,也为着纪念这位为黑龙江学人、学术的进步,为祖国的学术繁



荣不懈奋斗的可敬可佩的学者,我们仍将敏中先生作为这一辑的主编。

该辑收入著名学者吕冀平、刘敬圻等 12 位学者的文集,内容涉及语言学、文学、史学、政治学、辞书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等学科,反映和代表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诸学科的最新成果,对于推动国内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和中国学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该辑诸学科的内容,除观点前卫外,仍贯穿了上一辑“思”的理念:有面对学科建设之思,有面对社会发展之思,有面对人类灵魂之思,有面对中国未来之思。相信这些学人之“思”,能给广大读者带来更多的人生、学术与社会的思考,启发更多的人将“思”付诸于“行”,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的学术,更好地建设中国的社会,迎接中国更美好的未来。

该辑的出版距上一辑已有四五年的时间,因而该辑所收文稿在时间跨度上较上辑有所突破,即不限于 1998 年,近年来诞生的新的学术成果,理当收入。

在敏中先生逝世后,黑龙江大学的衣俊卿、丁立群、邹少华诸先生做了许多组织工作,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4 年 11 月 22 日



一篇论文的诞生(代自序)

我写《论作家“自我”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前后历经了三年,文章在《北方论丛》1983年第4期发表后,《新华文摘》同年第10期转载。由于文中涉及“自我”字样,还闹出了一场苦恼和虚惊。理论工作者写理论文章的甘与苦,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论文写作,首先碰到的是选题。一个好的选题的诞生,往往受着生活的启示和触发,渗透着作者的人生经验,凝聚着评论家痛苦的思考。

我选择“作家自我”这个题目来研究,起先是受了《假如我是一个作家》这篇文章的启发。那篇文章提出的一个鲜明观点是:“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努力做一件在今天并不容易做到的事,那就是表现我。”把“表现我”作为创作的一个口号提出,自然有许多不严密、不科学之处,但它是针对多年不准谈“我”的“左”的思潮而发,富有启发性。当时,引起了一场论争。批评这种观点的调子越来越高,有的甚至把它同现代派的祖师爷们连了起来。使我感触很深的是:“假如我是一个评论家”,我应该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认准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大字。我觉得自己从事理论工作20年的教训,关键就在于没有



“实事求是”。当年,我怀着沸腾的热血,以圣洁的虔诚,写出的那许多文章,有多少是实事求是的呢?错误的理论,有过把创作引向歧途的教训;当年在理论上归纳和批判的许许多多的“论”(比如“写中间人物”论、“写真实”论等),曾经多么无情地挫伤了作家艺术想像的翅膀啊!

一种“觉今是而昨非”之感,使我有勇气去面对现实。其中我联想起又一件事情:“文革”中黑龙江省作家创作出版了16部长篇小说,数量列全国之冠。当时,我们还庆贺过创作的丰硕成果。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东西都成了废品。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作家们,面对自己的“成果”,仿佛是患了一场心病。他们多年辛辛苦苦积累的素材浪费了不说,还要承担一种舆论上的嘲讽和谴责。真是咬碎舌头咽到肚里,有苦说不出来。凭心而论,作家们是没有过错的,他们不正是受“触及时事”、“写走资派”和“路线斗争”的理论指导,响应号召才积极从事创作的吗?多少年来,宣传一种作家必须忘掉自己的理论,作家不能畅所欲言地讲真话,抒真情,向读者交心,他们根本忘记了自己是作为艺术创造的主体而存在着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批评面临着一种危机感,一些读者和作家都不相信评论家的高论。评论家要转变自己在群众记忆中的形象,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必须面向创作实际,用实践去检验过去的观点,对许多问题作重新认识,改进批评的方法。比如,对艺术生产主体的研究,就存在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批判过舒芜同志的《论主观》,批判过胡风同志的“主观战斗精神”。创作中提倡重视主观的观点,是个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力求把问题讲得辩证一些。而不能认为,在创作中作家要表现自己的生活、情绪和体验,都是“自我扩张”,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更不能像“四人帮”搞的那样,连在自己作品上署名都不准。文艺创作中多年不准谈“我”,或者只讲“大我”的理论,使许多有独

创性的诗人和作家,丧失了自己的风格。正如诗人张志民所说,文艺界存在一种“病”的临床表现,“就是:忌讳谈‘我’。”(《从“我”谈起》)这个批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艺术生产的客观规律证明:不能把“我”同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同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等同起来。尽管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现代主义理论家,对“自我”都作过许多荒谬的解释。但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作家自我,澄清在“自我”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迷雾,使作家从极“左”思潮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确认识自己,从而解放艺术生产力,这是新时期文艺实践向理论家提出的一项光荣任务。

二

研究一些有争议的理论问题,会遇到许多风险,它要求理论家独立思考,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有辩证的思想方法,有不怕犯错误的勇气。可以说,我是顶着两股风头,来研究“作家自我”的。一股是鼓吹现代派文艺思潮的旋风;一股是批评“自我表现”说的热风。前一股风来势凶猛,打的是“解放思想”的旗号,其中不乏反传统的“勇士”。他们在美术、诗歌、文学领域,鼓吹创作就是“表现自我”。作家可以脱离生活,去表现“一个赤条条的我”,进而上升到“新的美学原则”,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内心的自我表现”,这些观点带有许多幼稚的盲目反传统的偏激情绪;后一种批判“自我表现”的观点,从大的原则上说都没有错,但是,有的文章,对作家在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要表现自己的事实,缺乏具体分析,没有划分清楚“自我”有两种内涵的界限。而是过于简单地挂下连,把一切产生不健康作品的根源,都归结为是“自我表现”所致。

要是在以往,我会采用“顺坡滚石头”的办法,找出几句经典作家的言论,用大原则一套,批倒批臭。这样的文章好写,且政治上



保险,发表容易。可实践证明,教条主义的批评,既不能把人压服,也不能把人说服。我试用分析的方法,把“自我”划分为若干层次:一种是哲学上的“自我”,一种是艺术表现中的“自我”。这两种“自我”还可以分: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解说,一种是资产阶级反理性主义的解释。他们在观点和内涵上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分歧,有什么意义,用辩证法把正确和谬误,做多层次的切分,明确我们应该抛弃的是什么,应该继承的是什么呢?

在一次创作会上,我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在会上发了言。对于我的观点,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会后,还有人私下打听我是不是共产党员。言外之意,当前报刊上都在批判“自我表现”说,你在那里谈作家“自我”,岂不是要顶风上?果不其然,我的发言稿,从会议出的专刊上撤了下来。我的观点被认为是否认作家深入生活的,使我在研究这个问题上狠狠地碰了一次壁。

失败逼得我去认真读书。过去在学校受的是“正面教育”,对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知识知道得很少。为了弄清楚“自我”的理论渊源,我阅读了《现代西方哲学》,专门从书店买回费希特《人的使命》,浏览柏格森、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有关著作。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反理性主义,同我要研究的作家自我是什么关系。

理论要说服人,最重要的是拿出事实。既然有人怀疑谈“自我”会导致否认作家深入生活的意义,那我就从研究作家自我与生活的关系做起。照习惯的说法,生活是客观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但是,无数作家的创作经验证明: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是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差异性的。这说明客观生活要受作家“自我”的主观条件所支配。作家所能利用的生活素材,一部分来自亲身实践,一部分来自观察和体验,都不能同“自我”截然分开。我们只能说生活有主要、次要之分,要求作家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充实自己,而不应把“我”和生活对立起来。

其次,研究“自我”与时代、人民的关系,我不同意有“纯自我”的说法。马克思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这种特殊性,使人“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①我们只能说“自我”代表的群众是多还是少,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们可以要求作家“自我”代表的生活面广一些,尽可能通过“自我”去表达多数人的理想和愿望,争取做一个反映时代的大诗人、大作家。

第三,研究作家“自我”,同艺术个性和风格的关系,我发现所有有独创性的作家,他的艺术个性和风格,都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成熟的作家,都懂得如何在创作中“认识自己”。刘绍棠说:他有“三不写”,对我很有启发。他不写知识分子,不写历史题材,不写诗。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他的长处。巴金、孙犁把作品中有“我”视为艺术的生命。王蒙苦心地“寻找自己”;邓友梅读书和写作都找与自己“性相近”的东西。屠格涅夫希望作家们用自己特殊构造的喉咙,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切都说明,作家勇敢地表现了自己,才有艺术的独创性,才有艺术的个性和风格。

我研究作家自我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作家表现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不是现代主义的自我表现,也不是引导作家脱离时代和人民,钻到个人主义内心世界去自我欣赏。恰恰相反,是要作家学会认识自己,更加积极地去生活,做一个自觉的艺术家。这不是降低了而是更加提高了对作家的要求,不是否定了,而是更加肯定了作家深入生活,实现自我改造的必要。因为,作品是作家人格的化身。作家要在作品中塑造好人物,必得先在生活中塑造好自己。如果完全否定了表现自己,把创作全然归之于客观,那提倡作家深入生活,改造世界观,还有什么必要呢?我认为这样去研究作家自我,就同西方“自我表现”说,划清了界限。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三

当然,我对作家的认识,并不是一次就正确了。我的论文初稿反复征求了二十余人的意见,重大修改有五次。我的稿子先后寄给六家期刊,有的像石沉大海,一张油印的退稿条都没有回我;有的委婉地回信,说几句无关痛痒的客气话。有个和我很知心的朋友看了稿件说:“可写的题目那么多,你何必要自讨苦吃,去碰这个惹麻烦的问题?”朋友的忠告是真诚的,但我想到了评论家的责任。实践提出了许多问题,评论家要不要给予解答?如果大家都同现实保持距离,回避尖锐的矛盾,理论指导实践的意义,岂不是一纸空文?记得国外有位作家说过: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作家,一种是利用现成的格式写作的作家,一种是打破常规、不断地创造新的写法的作家。他把后一类作家称之为宇航中的试飞员。试飞员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探险,为别人开辟新的道路。多年的评论工作,使我形成一种观念:我认为大凡有争论的问题,都是有某种研究价值的。所以我喜欢阅读《作品与争鸣》,对凡引起争论的理论学术文章,也有浓厚兴趣。就是读一些有定评的文章,也常常神经过敏地找出一些疑问,我的这种思维方法不是“怀疑一切”,而是职业养成的一种“病”。

“求异思维”常使我产生某种奇怪的想法。比如“表现自我”的问题,它是西方现代主义反理性哲学思潮的核心,名声够臭的了。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有不少作家、理论家在信奉它和研究它?我国古代文论中,论述这个问题的就有不少。刘熙载的《艺概》说,无论诗文,“皆有个自家在内”。《随园诗话》又载:“为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则自恃徇用之病多。”“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

之弊大。”^①我国古人,同西方现代派作家生不逢时,他们早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了。把表现自我说成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专利,显然不符合事实。这种古人今人都感兴趣的现象,说明问题复杂;常批不臭的原因,说明这其中必有可资利用或借鉴的因素。

有人说“爱思考是一种不幸”。追求思维的求异性是容易犯错误的。顺着习惯思维,说大家说过的话,说起来顺嘴,不动脑筋,即使话说错了,还可以受蒙蔽无罪。可是,这对于研究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我们要力求做到少说错话,不犯错误。但是,要想搞出一点儿有创见的研究,错误又常常是不可避免的。错误从总体上看不正确,但它用实践忠告人们“此路不通”,启示后来者另寻新路。从真理发展的道路上说,它从反面映照真理的光辉,引导人们向通往真理之路前进。

我是抱着一种“试飞”的心情去研究我的论题的。在搜集资料 and 写作过程中,我常常设想,在我的对面站着许多准备同我辩论的人,我要认真推敲我的论点和论据,尽可能把话说得周全一些、客观一些,不要给对方留下把柄。我抱着一个目的,讲真话,讲自己的观点,真话不一定都正确,我的真话也可能是谬论,但它是通过我的头脑讲出来的,即使挨了批判,心里也舒坦,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好从中获得对真理的认识。在学术研究上,最可宝贵的是一种老实的态度,我希望自己做一个这样的人。

四

(一)一篇论文如何写出来,在它背后的思想活动是极其复杂

^① 袁枚:《随园诗话》卷七。